



ZHUANSHI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中国史学史

◎ 白寿彝 主编

瞿林东 著

魏晋

南北朝

隋唐时期

第 三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史學史



ZHUANSHI

中国史学史

◎ 白寿彝 主编 瞿林东 著

第 三 卷

魏晋

南北朝

隋唐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学史.第3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白寿彝主编;瞿林东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524-1

I. 中... II. ①白...②瞿...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②史学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472 号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中国史学史

(第三卷)

白寿彝 主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瞿林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9.25 插页 4 字数 470,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6524-1/K·1252

定价 49.00 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形势与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1
第一节 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形势	1
一 朝代频繁更迭和隋唐的统一	1
二 民族、门阀、中外交流	2
第二节 史学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8
一 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8
二 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16
三 直书与曲笔的斗争	27
四 转折与创新	33
第二章 “正史”撰述的兴盛	36
第一节 撰写皇朝史的高潮	36
第二节 《续汉书》和《后汉纪》的思想特点	43
一 司马彪与《续汉书》	43
二 袁宏与《后汉纪》	45
第三节 范曄《后汉书》的成就	47
一 范曄撰《后汉书》	47
二 范曄的历史形势观和社会伦理观	49
三 《后汉书》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	61
四 《后汉书》史论的境界	71
五 《后汉书》在史学思想上的两个特点	81
六 范曄历史思想的局限性	89

第四节 陈寿《三国志》的特点	91
一 《三国志》在历史编纂上的特点	91
二 陈寿的历史思想	95
三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100
第五节 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朝史撰述	106
一 沈约和《宋书》	106
二 《宋书》志的成就	107
三 萧子显和《南齐书》	111
四 魏收《魏书》及其特点	113
五 魏收《魏书》与门阀势力	115
六 魏收《魏书》的历史地位	118
第三章 “正史”撰述的进一步发展	121
第一节 史学发展的重大变局	121
一 关于私人撰写国史的禁令和隋朝修史的失误	121
二 “《汉书》学”的兴起	125
第二节 历史意识的增强和史馆的设立	128
一 关于撰写前朝史的认识	128
二 历史意识的增强和皇家史馆的设立	130
三 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的兴盛	132
第三节 五代史纪传和《五代史志》	137
一 五代史纪传的成书	137
二 《隋书》的历史思想	138
三 《五代史志》的历史价值	145
第四节 唐修《晋书》及其历史意义	147
一 唐太宗的《修晋书诏》及其对诸家晋史的评论	147
二 唐修《晋书》是一部完整的晋朝史	149
第五节 《南史》和《北史》	151
一 李大师的南北史观念	151
二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	154

三 《南史》、《北史》的历史编纂思想	157
四 《南史》、《北史》的历史影响	163
第六节 “正史”撰述的成就及其局限	167
第四章 通史、地方史和民族史	170
第一节 通史撰述不断增多的趋势	170
一 南北朝时期的通史撰述——《科录》和《通史》	170
二 唐代史家的纪传体通史和传记体通史撰述	172
三 唐代史家的编年体通史撰述	174
四 唐代史家的典制体通史和文征体通史撰述	178
五 通史撰述复兴的意义	181
第二节 地方史和民族史撰述	184
一 地方史撰述	184
二 民族史撰述及其历史价值	187
第三节 地理书和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	189
一 《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	189
二 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	195
第五章 谱牒之学的显要地位	200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谱牒之学	200
一 门阀重谱牒之书	200
二 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	201
三 谱学之弊	204
第二节 唐代的谱牒之学	204
一 谱学在唐代的兴替	204
二 唐代谱学与士庶斗争及社会风气	211
三 家史与别传	219
第三节 礼书的纂修	221
第六章 起居注、实录、国史及会要	226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起居注的撰写	226
第二节 唐修实录的成就	228

一	唐修实录的几个特点	228
二	韩愈《顺宗实录》的历史价值	231
第三节	唐代的国史	236
一	唐国史的修撰	236
二	吴兢和唐国史	238
三	韦述、柳芳与唐国史	240
第四节	会要体史书	242
一	苏冕撰《会要》	242
二	《会要》的面貌	245
三	苏冕的史识	249
第七章	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257
第一节	魏晋至唐初史学批评的演进	257
第二节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和《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	259
一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	259
二	《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	261
第三节	刘知幾的“史才三长”思想和史学功用论	266
一	史才、史学、史识	266
二	史学的审美要求	268
三	史之为用 其利甚博	271
第四节	刘知幾史学思想的局限	273
一	《六家》、《二体》未能包举百代史学	273
二	三志并非“为志者所宜先”	275
三	名实、体例和史识	277
第八章	第一部宏伟的典章制度史——《通典》	281
第一节	杜佑所处的时代和《通典》的宗旨	281
一	杜佑所处的历史时代	281
二	《通典》的撰述宗旨	284
三	《通典》的社会历史思想	290
第二节	《通典》在历史编撰上的创新	295

一 关于立分门	296
二 关于主会通	299
三 重视前人的论议得失	300
第三节 《通典》撰述的逻辑方法	305
一 《通典》之宏观考察的逻辑方法	305
二 《通典》之微观考察的逻辑方法	310
第四节 杜佑史论的特色及理论价值	312
一 序和论	313
二 说、议、评的区别	314
三 “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的方法论原则	317
四 史学批评	318
五 人物评价及其他	321
第五节 《通典》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	323
第九章 历史文献学的成长	325
第一节 史书部类趋于定型	325
第二节 史注的突出成就	327
第三节 文献整理,总集、类书和历史笔记	332
第四节 历史文献学思想的不断丰富	338
一 关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认识	338
二 关于文献学史的思想	342
三 关于史注的见解	345
四 唐代君臣对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视	350
第十章 历史思想的特点及主要成就	353
第一节 历史思想发展大势	353
第二节 关于天人关系之认识上的突出进步	359
第三节 历史人物评价和《人物志》的理论价值	361
一 历史形势与历史人物	361
二 《人物志》的理论价值	362
第四节 关于君主的评价及其理论上的探讨	365

一	关于君主的评价	365
二	虞世南与《帝王略论》	367
三	唐太宗与《帝范》	371
第五节	历史认识与治国论的丰富	377
第六节	兴亡之辩中的方法论	388
第七节	民族观及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	395
第八节	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新认识	398
第十一章	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	405
第一节	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	405
一	发展大势及主要问题	405
二	史传通议和史学通论	406
三	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411
第二节	关于史学与经世致用及政治决策的认识	415
一	史学家对政治的关注	415
二	史学与经世致用	418
三	政治家的史学自觉	421
四	史学自觉对政治实践的意义	423
第三节	史学批评意识的提升	429
一	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审视	429
二	关于史学批评之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认识	431
第四节	体裁、求真、良史相统一的思想	441
一	重视体裁的优良传统	441
二	体裁、求真和良史的统一	442
第五节	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	447
一	史家多用比较之法	447
二	《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	448
三	历史比较的意识和历史比较的标准	456
后 记		458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形势 与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第一节 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形势

一 朝代频繁更迭和隋唐的统一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其子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并将汉献帝的年号改为延康。这年冬天,汉献帝迫于形势,同曹丕演出了一场极富悲喜剧色彩的政治禅代的闹剧。汉献帝在“禅位”册书中,一面援引尧、舜、禹的禅位故事,一面又借用“皇灵降瑞,人神告徵”的名义,给这种严酷的政治斗争涂上一层庄严肃穆的色彩。

曹丕称帝,改国号为魏,建元黄初,这标志着东汉政权的结束,同时揭开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序幕。次年,刘备称帝,建立蜀国;又过一年,孙权称帝,建立吴国。三国的纷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表现得有声有色,而在经济上也各有所恢复和发展。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蜀后主炎兴元年),魏灭蜀,打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两年后,司马氏仿效汉魏“禅代”故事,夺取了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皇朝。西晋和吴的并存,代替了原先的三国分立。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吴末帝天纪四年),晋灭吴,结束了三国以来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统一。

西晋的统一是短暂的,在它统治的后期,已有成、汉、前凉等民族政权的建立。由于政治腐败和民族矛盾的发展,西晋在愍帝建兴四年(316年)为刘聪所灭,全国又陷于分裂之中。

西晋灭亡的第二年,镇守江南的宗室司马睿即帝位于建邺(今江苏南京),是为东晋。在东晋存在的一百零几年中,中国北方先后出现了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几个政权的兴亡更迭,是为十六国时期。

东晋在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为刘裕所灭。刘裕建立了宋皇朝,继之是宋、齐、梁、陈的更迭,史称南朝。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经过百余年的大规模迁移、斗争、组合与融合,至北魏太延五年(439年)统一了北方;而后,北魏经历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分裂和更迭,至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齐武平元年),北周灭北齐,北方重新归于统一。大定元年(581年),北周被隋朝所取代。隋朝建立后,进一步谋求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为南下灭陈作积极的准备。以上,史称北朝。南北朝的对峙与交往,持续了一百七十年之久。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军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自三国以来大约三百七十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在政治上又出现了统一的皇朝。隋朝只存在三十多年,于大业十四年(618年)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但它在开创新的政治统一局面方面,是有伟功的。

隋亡之年,唐朝建立。隋唐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次出现的两个蝉联的统一皇朝。秦汉和隋唐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不同的是,隋唐的政治统一,是在经历了几百年间许多皇朝的并立、对峙、更迭和许多民族的迁移、斗争、组合与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具有更充实、更丰富、更深刻的历史内涵。

唐皇朝创造出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持续百余年的发展势头,造成了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伟大的领先”。唐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历史进程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唐皇朝结束了它的极盛时期而开始走下坡路了。晚唐的各种矛盾的激化终于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统治阶级中的各种政治势力也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天祐四年(907年),年少的唐哀宗被权臣朱全忠所逼,“奉皇帝宝绶,敬逊于位”^①,其诏书、册文与实际步骤,同汉魏“禅代”如出一辙。

历史竟如此“巧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六百六十七年的历史,以“禅代”始,亦以“禅代”终。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内涵无疑要比这种历史表象复杂、丰富得多。

二 民族、门阀、中外交流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历来有不同的评

^① 《旧唐书·哀帝纪》。本书所引“二十四史”,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价。司马光认为：魏晋皇室“骨肉相残”，“而胡、羯、氏、羌、鲜卑争承其弊，剖裂中原，鬻醢生民，积骸成丘，流血成渊，几三百年，岂不哀哉”^①！司马光指出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处于分裂争战之中，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论是十六国，还是北朝，各封建皇朝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它们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这一点，司马光却没有指出来。其实，早在唐初，人们对此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有几句话是涉及对东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评价的。他说：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祚，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②

李渊用“嘉谋善政”、“立言著绩”不乏于时来评价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显然不同于把这时期的中原的历史视为漆黑一团的想法。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两朝，北朝的魏、齐、周、隋四朝（魏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实则是六朝；隋出于北朝故列于此）。唐初君臣的这种认识，从政治上看，他们并不认为在分裂时期的一些皇朝都是无所作为的；从民族上看，一方面他们固然还不能摆脱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的确认识到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识到各族关系的密切对于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唐初提出了修撰“六代史”的计划；其后，在承认前人所修《魏书》之史学地位的基础上，写出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志》，反映出对于这些皇朝历史地位的尊重。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撰的《晋书》，是唐初史家所撰前朝史中对少数民族仍不免歧视而又比较突出的。即便如此，《晋书》对十六国的历史还是重视的，并采用“载记”这种特殊的体例予以表述，而在具体的评价上亦根据事实有所肯定。如在对石勒的评论中有这样的话：

观其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谋间发，猛气横飞。远嗤魏武，则风情慷

^① 《稽古录》卷一三“臣光曰”。

^② 《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慨；近答刘琨，则音词倜傥。焚元超于苦县，陈其乱政之愆；戮彭祖于襄国，数以无君之罪。于是跨蹶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材而窃徽号，拥旧都而抗王室，褫毡裘，袭冠带，释介冑，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①

又如记苻坚之事，其中讲道：

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

……

坚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②

从这些记载来看，对于十六国中的后赵和前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不能随意否定的；即使是对十六国中的其他各个割据皇朝，也不能完全视为历史上的消极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移、民族纷争与民族融合，不仅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而且也促进了更大规模的政治统一。对此，隋与唐初统治者都有十分明确的认识：既有“君临万国”、“抚临天下”的威严，又有“四海乂安”、“天下大同”^③的局面。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

① 《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后论。

② 《晋书·苻坚载记上》。

③ 以上均系隋文帝语，见《全隋文》卷一。

央官。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①。在这里，李渊和李世民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胡、越一家”、“四夷入臣”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喜悦和称颂。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民族关系的这种历史性的新发展，尤有深刻的认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他十分认真地总结了民族关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史载：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之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把能够同时做到“平定中夏”、“服戎、狄”看作是政治上成功的大事，看作是他超过前人的主要标志。唐人所谓“天下一家”的观念，不仅有政治上的含义，也有多民族的含义。

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门阀时代，即门阀地主在统治阶级中占领导地位的时代。门阀地主的形成有不同的来源，或由东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或是魏晋豪强地主在政治上得势演变而来，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必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家族声誉积累的过程。门阀统治的特点，是以家族结构同封建经济、政治的密切结合。它兴起于魏晋，消失于唐末，是这一时期封建统治的特殊形式，有其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南宋史家郑樵对这种统治形式有如下的概括：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①

郑樵说的“隋唐而上”，当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他说“近古之制”，也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典型而延续至隋唐。五代以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可以说，谱学的兴衰同门阀的兴衰是一致的。郑樵从官府、私家的谱系之学与谱系之书的盛衰，中肯地道出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国时期，吴、蜀对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有积极的措施。这不仅为它们的割据称雄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西晋末年，北方动乱，晋室东渡，人口南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宋书·州郡志》记载了“遗民南渡”和侨置郡县的一些情况，勾勒出一幅幅人口南迁的历史画面。人口南迁，不独是门阀士族的南迁，更是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同时也是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南传和中原思想文化的更大规模的南移。在此基础上，南方的城市、交通有了更大的发展。《隋书·地理志》极言扬州之盛：称丹阳“埒于二京，人杂五方”，京口则“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而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则“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同书记荆州说：“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通典·食货十》记，贞观、永徽之际，“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而至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其绝大部分出于江南，可见江南漕运对于关中的重要。同书《州郡十二》记扬州风俗说：“永嘉之

^① 《通志·氏族略》序。